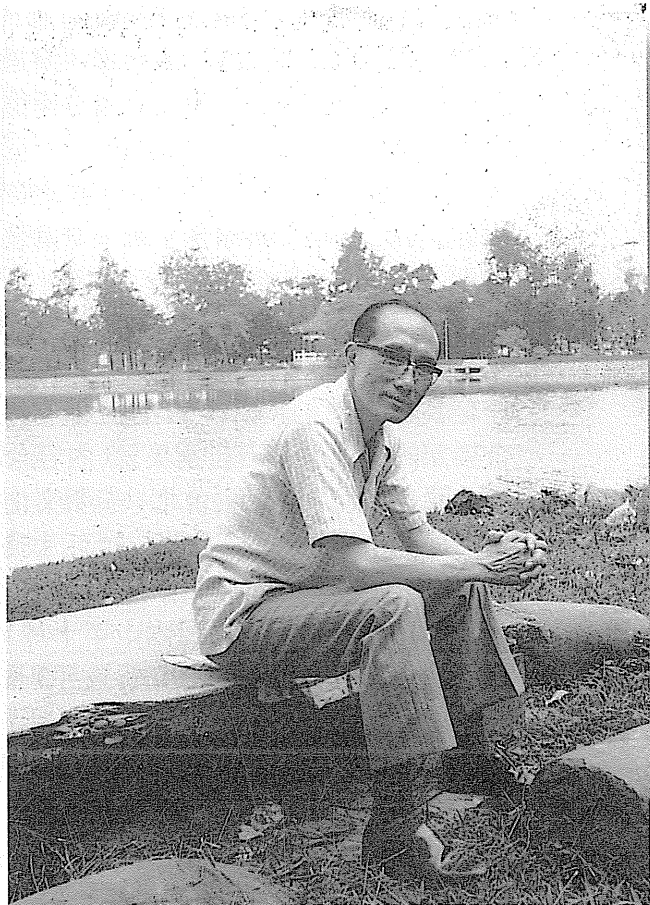


蔡丹冶（1923～2000）

蔡丹冶先生，本名蔡偉濂，字寄天，另有筆名龍田夫、艾浦、丁力、丹冶、舒玄、舒弦、凌羽揚、歐陽舒丹，廣東省汕頭市人。生於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三日，國立北平大學（西北聯大）中文系畢業，曾任粵、桂、黔、臺等公私立中學主任、副校長、大專兼任教授、《大陸觀察》月刊社總編輯。曾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評論獎、國軍新文藝金像獎文藝理論獎。



此照片由陳大成女士提供

蔡丹冶的創作歷程除文學外，文藝批評也開始的相當早，根據蔡丹冶自己的說法，他的第一篇文藝評論是高師二年級時候的〈評舞台劇「迷途的羔羊」〉，發表在家鄉汕頭的《僑聲報》的副刊「南風」，一開始就是寫評論，但是第一次之後，直到汕頭淪陷，蔡丹冶前往桂林之前，就再也沒有寫過評論了。抗戰末期和勝利之初，蔡丹冶在貴陽、重慶教書，在蹇教授的主編的《貴州日報》副刊「新壘」和「扶風週刊」下，以抗戰故事為題材，替各地報刊寫小說、散文和通訊。

一次偶然，又寫了一篇評論，得到蹇教授的鼓勵並替蹇教授的刊物寫批評。蔡丹冶自言當時年輕氣盛，筆下刻薄，在一次評論中，嚴重傷害了一位陌生作者的自尊心和寫作的信心，蔡丹冶長久深感歉然與內咎，故又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不寫評論，以免傷人損己，後來反省，這種態度雖消極而並不可取，但卻是當時的真情實意。

一九六一年秋，孟瑤女士開始在「中副」連載其〈浮雲白日〉，連載結束，蔡丹冶隨之寫〈論〈浮雲白日〉〉（發表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十一日「中副」，後收入評論第一集中），這是蔡丹冶停寫批評多年後的第一篇，蔡丹冶因此認識了孫如陵先生，並獲得其

鼓勵和約稿，從此以後，蔡丹冶除本位工作外，就以寫評論為主，而少有時間寫小說和散文了。但因為有了貴陽的一次教訓，後來蔡丹冶寫文藝評論的時候就力求嚴肅、敦厚而絕不刻薄、諷刺，他自認限於學養而評長論短不夠深刻，但總是衷心而發，有人說這時的蔡丹冶變得專說優點，其實不然。

蔡丹冶自己區分了兩種批評：第一種是消極的、否定的，把評論當雜文寫，潑辣諷刺，隱美揚醜，專門挑剔，誇張缺點，像他自己年輕時所做的一樣，務求把作家、作品說得一無是處而後快；第二種是積極的、肯定的，也就是綜合分析，評長也論短，但把重點放在作品的優點和作家的思想闡明與分析上，缺點只做原則性的指出，非絕對必要，不必舉例，尤其忌諱挖苦，這樣作者自能考慮，讀者自能會心。蔡丹冶自言已經從第一種批評進入第二種批評，也就是以嚴肅敦厚、是是非非為寫作的基本態度。

蔡丹冶在出版兩本評論集後，文藝評論就越來越少，因為了解了批評的嚴肅性而不敢任意執筆，所以他希望把大部分時間放在讀書和研究之上，這是深感一個文藝工作者忙於寫作開會而沒時間讀書研究的悲哀，因此雖然對文藝的熱愛依舊，卻願意暫時停止，即使最後一無所成也不後悔，正如宗教徒不一定要擠在神的身邊，也不一定要進伊甸園或西方淨土才算有成就一樣。

除此之外，對文藝的熱愛也讓蔡丹冶關心到在大陸統治下受苦受難的文藝工作者，頓時感覺到從事大陸文藝問題研究的

重要性，蔡丹冶認為若不在這方面多付出時間和心血，以撻伐之筆，嚴肅而公正得指出和譴責共匪戕害文藝的罪行，那簡直是失職，基於這個自覺認識，蔡丹冶遂由文藝評論工作轉向研究共匪文藝問題。《中共文藝問題論集》一書就是觀察大陸文藝地獄所得的報告書，也是共匪文藝罪行的歷史證詞。

蔡丹冶的朋友蕭白，覺得他確已走上了成功的道路，他最初從事的是創作，像若干有成就的評論家一樣，在窺知創作的堂奧之後，跳了出來，所不同的是他並未完全放棄創作，在生活的「夾縫」裡，仍有相當多的詩、散文、小說出現，不過他把他們當作「副產品」罷了，蕭白深信，只要蔡丹冶的腳步不停，繼續前行，他會有更大的成就。當然，蔡丹冶不願意自己「到此為止」，他仍然希望：未來是個豐收季。

蔡丹冶的寫作範圍包括詩、小說、散文及論述，而以文藝批評見長。其代表著作有散文、論述評論、合集等三種。其中合集類的有《蔡丹冶自選集》（內容含論評、散文、詩、小說，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民七十八年三月）。散文類有《淡淡集》（與王元、張家友、章江合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六十年十月）。論述評論方面較多，有《文藝論評》（台北：瞻望出版社，民五十六年十月）、《文藝論評》（台中：普天出版社，民五十七年十月）、《西方文學家素描》（台北：哲志出版社，民五十九年七月）、《新文藝論集》（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民六十二年九月）、《中共文藝問題論集》（台

北：大陸觀察社，民六十五年九月）、《中共文藝政策與文藝整風》（台北：劍潭出版社，民六十六年七月）、《批評與作品》（台中：普天出版社，民六十一年七月）。

蔡丹冶的《中共文藝問題論集》亦極為重要。內容分為二輯，第一輯有〈從「五四運動」到「三十年代」〉、〈論「三十年代」和「周揚集團」〉、〈簡論毛澤東文藝思想和匪黨文藝政策〉、〈共匪的文藝組織和「文藝整風」〉、〈簡論「周揚集團」的「文藝定點論」〉、〈論周揚反毛和江青奪權〉、〈「於無聲處聽驚雷」——論江匪青的文藝作三原則〉，第二輯有〈論陸定一〉、〈論陳登科及其代表作「風雷」〉、〈共匪對《紅樓夢》的曲解〉、〈共匪批關公蚍蜉撼大樹〉、〈簡論〈韓非子〈孤憤〉譯注〉事件〉（附：南鐘〈韓非子〈孤憤〉譯注〉全文）、〈從「陳勝吳廣起義圖」談起〉、〈共匪解禁外國文學作品和攻擊純音樂〉、〈共匪又在大陸文藝界展開空前大掃蕩〉。最後同樣有〈後記〉一篇，說明著書原委，亦即從文藝批評轉向共匪文藝問題的動機，又介紹本書特色及出版過程，同樣真摯感人。

蔡丹冶尙對巴斯特納克（Pasternak, Boris, 一八九〇～一九六〇）所著《齊瓦哥醫生》作出書摘和評介，收於《世界文學名著鑑賞》第四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七十二年）。（蕭友泰）